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正在呈现展览“安妮卡 · 易：另一种进化”，营造了一个跨越生物学、技术、哲学与艺术等不同领域的多感官世界，艺术家安妮卡 · 易的创作实践为我们重新思考人类进化、创造力和共存形式的本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平行系列对话“共栖与绵延”由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与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联合发起，旨在发现不同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哲学领域的思考者与当代艺术创作者之间的合作与共振，就“利他机制”、“自我意识”等话题从不同角度切入交流，以及如何在真实且连续的时间体验中形成历时性的互文机制。该系列的三场对话将邀请生物学、医学人类学以及科幻写作等领域的学者，与具有跨媒介创作经验的艺术家们展开对谈。

系列对话的**第二场活动**中，人类学家赖立里与艺术家郭城围绕**“自然代码、身体语法与技术寓言”**展开跨学科对谈。赖立里教授从人类学与科学技术研究（STS）的视角出发，探讨技术与身体的缠绕如何重塑与定义感知

——从后人类身体的流动性到物的伦理张力，揭示日常实践中技术实践与生命经验的复杂交织。艺术家郭城则以雕塑与装置为载体，通过剖析基础设施、数字身份与算法权力对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双向编码，将其中抽象的纠缠关系转化为可感知的感官体验。从“自然代码”的系统性到“身体语法”的规则性，再到“技术寓言”的叙事性，两位嘉宾打破学科界限，共同追问：技术是否可能成为重构自然秩序与身体认知的“语法”，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是否可能超越工具性逻辑，转向更具开放性的共生叙事？对话以去中心化的视角，引领观众展开一场关于技术民主、生态感知与未来主体性的思辨探索。本场活动由 UCCA 公共实践策划人王佑佑主持。

讲座简述

田野中的卫生实践：技术如何书写日常

“共栖与绵延”第二场对话活动现场，嘉宾赖立里正在发言，2025 年 5 月 10 日，UCCA 北京报告厅。

演讲开篇，赖立里针对本次讲座题目“自然代码、身体语法与技术寓言”提出了问题：自然代码是什么？自然有内在规律吗？身体似乎也需要找到规则成为一个系统，那如何理解开放的、不成系统的身体？技

术一定指向未来，是关于未来的叙事吗？从以上三个角度的问题出发，赖立里以自身研究经历展开了本次讨论。

赖立里首先向观众展示了某村庄的旱厕的照片，并向观众解释：“如果不仔细看，你们会觉得这里‘脏’，但水泥地专门通向厨房，脸盆架和热水瓶的摆放都有讲究。”照片中，塑料袋包裹的卫生纸悬挂在旱厕角落，台阶式设计防止污水倒流。她提到自己初到村庄时的尴尬经历：“房东问我为什么要住她家，说农村很脏，结果住久了才发现，我比他们更‘脏’——他们能用热水瓶随时洗头，我却连挽袖子低头洗头的勇气都没有。”这种身体经验的冲突，让她反思城市卫生标准的局限性：“我们依赖下水道和垃圾处理厂，但这些系统本身也在制造新的生态矛盾。”当村医家装上冲水马桶后，赖立里追问：“污水去哪儿了？”答案直指现实困境——储水罐利用自然水压冲水，排水最终流入屋侧土坑，雨季时顺着集体时期修建的老水渠冲走——国家推广厕所革命二十年，但深层工程依然缺失。卫生不是单向的‘进步’，而是身体、技术与自然的三方角力。

赖立里拍摄的农村旱厕照片，图片由嘉宾提供。

采药人的技术哲学：有效性与自然辩证

“‘强盗草’必须从海拔 2000 米以上的背阴坡挖，种到自家后院还得用石头磨碎——戴手套是为了防毒，但石臼才能保证药性。”赖立里以广西瑶族医生的采药经历为例，强调草药效用的双重性。医生冒险采掘有毒根茎来为治疗患者膝盖窝的毒疮，但被问及“是否有效”时却反问道：“你相信命运吗？”

赖立里拍摄的草药制作照片，图片由嘉宾提供。

在羌族诊所，电针仪器与传统拔罐药罐并置，晒干的草药被加工成药膏，药柜上的瓶罐装着保密配方。“医生不会谈论‘自然是什么’，他们只关心药是否起效。”或许，有效性本身就是自然与技术的共同作品——阳光雨露塑造草药生长，而医生的经验让自然物质转化为治疗力量。

辅助生殖技术：身体的“运气”与技术的边界

通过一组辅助生殖技术病房的照片，赖立里揭示技术权威与身体自主性的张力。尽管患者严格遵循生理

周期服药、注射激素，但微信群中“接好运”的调侃暴露了技术的脆弱性。“医生将部分成功归因于‘运气’，因为即便符合所有医学指标，胚胎能否着床依然充满不确定性。”也许现代辅助生殖技术可以模拟自然周期，但真正的叙事似乎仍是由身体书写。

赖立理跟拍辅助生殖技术影响下妇女生活的照片，图片由嘉宾提供。

从计算机“bug”到地质时间

“共栖与绵延”第二场对话活动现场，嘉宾郭城正在发言，2025 年 5 月 10 日，UCCA 北京报告厅。

郭城的演讲围绕其在北京 798 魔金石空间的个展“虫”展开。1947 年，一只飞蛾飞入美国 Mark II 计算机继电器导致故障，被工程师格蕾丝·霍珀记录为第一个计算机“bug”。展览以“bug”为核心，包含了两层含义，既是自然界中的昆虫，也是技术故障的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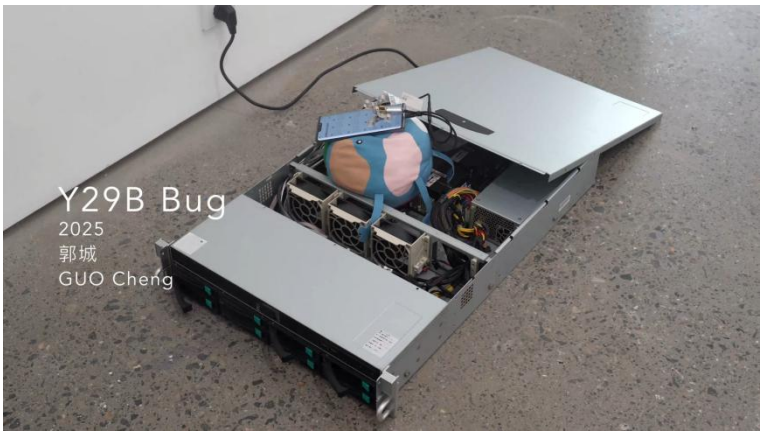
以此为引，郭城指出位居深山、水下的数据中心“在自然中掏了一个真空”——即便处于自然之中，数据中心仍然尽可能隔绝周边自然空间的物质往来，只留下能源、信息与热量的交换以维持运转。然而，耗费大量资源维持的“真空”状态并不能真正将技术与自然生态相区隔，反而彰显了技术与生态之间复杂的缠绕关系。基于此，展厅空间被分隔为两个相互连接、氛围迥异的空间： 外部空间明亮、洁净，模拟数据中心的质感；内部空间则相对昏暗、封闭。两空间通过一道“窗洞”相连。

在外部明亮空间的入口处，装置《石蛹》设置于防静电地板之上。郭城创作了两根形似地质岩芯的柱状

结构，并用网线桥架和网线进行缠绕，形成一种独特的质感。岩芯表面覆盖的绿色薄膜通过机械装置进行缓慢的升降和旋转运动，呈现除鳞翅目昆虫在蛹期内发育的状态。技术所依赖的物质基础源于漫长的地质时间，这件作品回应了人类为建造技术基础设施而从自然中大规模攫取资源的行为。

郭城《石蛹》，2025。图片由嘉宾郭城提供。

在明亮空间的角落，作品《Y29B BUG》展示了一个定制的倒计时软件。该软件驱动一个机械翻屏器，将年份不断向过去翻页，直至达到 64 位计算机系统的时间上限（约 292 亿年前）。软件下方压着一个地球玩偶，放置于服务器机箱底座上。“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作品设定的时间上限（292 亿年）远超地球约 40 亿年的历史和宇宙约 138 亿年的年龄，郭城指出这种技术设定的时间体量“相对无效”，如同“给蜉蝣设计万年历”——既揭示了人类历法在宇宙尺度前的局限性，也隐喻了以技术定义时间的荒诞性。



郭城《Y29B Bug》，2025。图片由嘉宾郭城提供。

月亮、导航失灵与昆虫寓言

郭城《月亮》，2024。图片由嘉宾郭城提供。

昏暗空间的中心位置，悬挂着装置作品《月亮》。其创作灵感源于科学家的“灯诱”活动：夜晚，科学家们用强光灯吸引昆虫以便进行观察、研究和标本采集。《月亮》装置探讨了一个关于昆虫导航的科学假说：许多夜间飞行的昆虫利用天体光源（特别是月亮）与地面形成的恒定高角度作为导航参照。当遇到地面强光人造光源时，由于光源角度低且距离近，昆虫的导航系统会失灵，导致它们不断地围绕灯光旋转飞行，直至精疲力竭。《月亮》也像“灯诱”一样吸引着观者，当我们嘲笑昆虫被技术（人造光）迷惑时，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在围绕着某种名为“进步”或“技术”的光晕盲目地打转?

作为占位者的技术基建

郭城“占位者”系列作品之一，2024。图片由嘉宾郭城提供。

当观众穿过“窗洞”进入第二个昏暗空间时， 展览主题转向技术基础设施对生态系统的介入和影响。郭城的《占位者》系列作品灵感直接源于其田野考察的观察。尽管被包装为“绿色能源”，郭城注意到风力发电机（特别是叶片）会杀死鸟类、改变局部气流，其环境影响不容忽视。作为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墨脱的公路建设过程让郭城深刻感受到基础设施对生态的切割作用——它将原本连续的生态环境分割成碎片化的区域，阻碍了物质交换和生物流动。在作品《占位者 No.2》中，郭城使用了垂直轴风力发电机叶片，将其与高压电缆连接。电缆上安装了一个小型 LCD 屏幕，通过两根细小的探针从高压电缆上巧妙取电。屏幕上循环播放着森林航拍影像。这件作品直观地表达了技术基础设施（如风电场）如同“占位者”（Niche Squatter），侵入了生态系统，抢占或改变了原本属于其他生物的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另一件相关作品《占位者 No.1》则使用了皮质手动变速杆作为核心元素，象征公路及其对自然环境的切割与干预力量，呼应了墨脱公路的观察。

在昏暗空间的角落，一件名为《雾取》的冷凝装置静静运作，其表面不断凝结出水珠。郭城通过这件作

品探讨了技术物被废弃后回归自然的另一种可能性：设想这样一个能持续产生凝结水的装置被遗留在缺水环境中，动物前来舔舐取水时与装置表面的反复摩擦，可能会使其特定区域变得越来越光滑，如同庙门口被香客长期抚摸而“包浆”的石狮。

观众在结束对第二个昏暗空间的参观后，必须再次穿过同一个“窗洞”，返回到第一个明亮的初始展厅空间。这一设计是对 1947 年飞蛾事件的完整隐喻性回应。那只飞蛾正是因为夜间计算机房窗户未关、室内灯光通明而被吸引飞入，最终撞入继电器导致故障并死亡。观众穿越空间的行为，在象征层面完成了这个故事的循环——在这个由技术、自然和观察者交织缠绕的叙事中，当观众从象征“田野自然”的暗空间穿回象征“技术环境”的亮空间时，究竟谁是观察者，谁又是被观察、被技术环境所困的“虫”？

酶、共生体与“无毛之虫”

演讲的结尾思考回归到“虫”的本质及其哲学意涵。郭城引用中国古代典籍《大戴礼记 · 易本命》中的生物分类法，指出人被归为“裸虫”，与“羽虫”（鸟类）、“鳞虫”（爬行类、鱼类等）同属于自然万物构成的巨大网络。

他从现代科学的角度进一步阐释了这种相互依存、共生演化的关系：人类并非全然独立的个体，细胞内的能量工厂“线粒体”，被科学界广泛认为源于远古时期侵入细胞的细菌，经过漫长演化形成了如今不可或缺的共生关系。人体肠道内存在着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微生物菌群，它们与人体健康息息相关，共同演化。

这些科学事实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类定义的边界。人类是“与周围微环境有协同作用”的共生总体（holobiont），应放弃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从更宏观的生态视角来理解自身的位置。

圆桌讨论

“共栖与绵延”第二场对话活动现场，左起王佑佑、赖立里、郭城，2025 年 5 月 10 日，UCCA 北京报告厅。

自然、身体与技术

王佑佑：谢谢两位刚才非常精彩的演讲。其实我想最先回应一下赖老师开头的问题——为什么要取这样的标题。因为看两位老师的研究成果，包括郭老师的创作，我们会发现“**自然、身体与技术**”这三个关键词一直穿梭在老师们的思考当中，但它们不是独立关系，不是用一个顿号就能说清楚的，它们其实交织在一起。

比如说自然代码，可能初看会觉得特别奇怪，“自然”让我们想到土壤、风等一些非常原始的元素，但实际上自然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改变。还有一个就是代码通过语法可能最后能够构成语言，它们或许存在一些递进关系。所以想稍微解释一下我们这个标题的最初思考逻辑，也趁着这个机会进入我们今天的圆桌话题。

首先就像刚刚说的，身体、自然和技术是缠绕关系。那我们可能先聊一聊自然和基础设施，这也是两位观察和思考中非常重要的两个关键元素。两位在刚刚讲述当中，从宏观的层面，不管是国家治理层面，还是郭老师分享的很多大型基础设施，或者是微观的对于细微生活和甚至昆虫的观察，两位都发现了基础设施和自然有一个交互的缠绕关系。那我第一个问题想问，自然在现在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否有一种新的自然？可不可以请两位先分享想法？

自然的重构：基础设施的生态占位

赖立里：刚才提到的村里的大渠特别有意思，它是集体时期兴修水利、方便灌溉农田的基础设施，至今仍存在且仍很重要，至少新厕所的下水可以通过它排到河里。甚至，他们还用它来和水泥、石灰盖房子，所以它仍有其用处。但回到自然层面，它一直位于村子中，环境一直在变化。从当时修渠改变村子面貌，到后来不断有新事物加入。最后，我提出它无法像城市里那种我们习以为常的状态。

实际上，农村村庄地下那些非常巨大的基础设施，至少根据我和村医的聊天，今天仍然是缺失的。这个基础设施本身一直处于变动中，并与我们的环境产生作用。所以，关于自然，我之前说过，我们不需要把它想象成是“nature”的自然，而是“自然而然”“顺其自然”，因此它一直在变化。

当然，自然也有反作用。郭老师的作品提供了很多例证，它不是一个被动的大地母亲，躺在那里任由你糟蹋，而是一直在和我们互动。它本身也在不断变化中。更不用说，我们所有人都是自然的一部分。

郭城：我非常同意。自然是一个流动性的状态，所以很难说区分新或旧，或者说现在自然怎么样，或过去怎么样。它是一个持续流动的状态，而且我们一直身处其中。其实这很好理解，就像鱼不知道周围有水，人也一直身处在这个环境之中，但很难窥见这个环境的全貌。从技术史的角度来说，有一个很关键

的时刻，就是第一个宇航员飞到太空，拍了那张著名的蓝色地球照片“Blue Marble（蓝色大理石）[1]”，就像鱼出水一样，感觉我们离开了盖亚，离开了地球，我们才知道其规模如此之大，我们在其中对生态的体验其实非常局部、微小。因此，在讨论生态平衡、生态变化、生态危机时，呈现的是一种局部化状态。但自然有其自然之道，处于不断平衡的规则中，人的行为、基础设施和人造物都包含其中。就像我之前分享的占位者概念，虽然有人工成分，但它在环境中也有其位置。

2005 年版 Blue Marble，图片来源于 NASA 官网。

王佑佑：郭老师提到展览起点处机房的环境，想要保持干燥、尽量干净，即与自然隔绝，但实际上这可能是一项徒劳的工作，没有真正起到作用，对吗？

郭城：对。我们花费大量力气创造自然的真空环境，耗费大量能源，恰恰证明了维持这种状态的困难程

[1]Blue Marble 是一个术语，用来描述星球漂浮在浩瀚太空中的形象。早在 1972 年，阿波罗 17 号任务的工作人员就首次捕捉到了地球的标志性卫星图像，并将其称为“Blue Marble”。从那时起，NASA 对这张地球卫星图像进行了多次更新，这些图像可在公共领域获得并可供重复使用。

度。为了维持这种状态，我们需要持续耗费能源，而不是简单地将瓶子拧上就不再变化。这种持续的能源消耗和投入，恰恰证明了生态圈层和技术圈层的不可分割性和互相渗透。

人体、感知与试验场：自由还是规训?

王佑佑：两位老师都提到自然具有流动性，那我们可能会想到下一个关键词，身体是否也有类似流淌的状态？我这边可能有一个问题。这个题目可能有些偏颇，但想作为一个观点提出，身体作为技术的试验场，我们认为它是一种自由还是一种规训?

王佑佑：我先插一句，我也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我一直在想，郭老师的展览中能否谈谈身体元素，以及你是如何处理或考虑身体这一元素的?

郭城：我觉得在展览中，如果从转场的空镜来看，其实并没有直接呈现身体。但我认为其中有一个隐含的逻辑，需要观众在其中穿梭才能体现出来。比如窗户，只有通过穿梭，才能呈现其周期性的变化。要接近“月亮”那件作品，它才是完整的、成立的，因为它有光亮，能吸引生物，这才是完整的作品。如果只是拍摄一张静态图片，它其实并不完整。所以，虽然展览中没有直接呈现身体元素，但身体其实是其中的隐藏脉络。当然，人造物肯定需要通过人的行为来制造。所以我觉得可能从这些层面上来反映身体的概念。

赖立里：当然，你可能马上会想到我们讨论的是人体，比如你很关注的石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你起的名字是石蛹，但我们看不到身体——石蛹的身体，这是非常精妙的一点。包括后面“月亮”那件装置，图片上告诉我们，你要把一个过程凝固在装置当下的状态，同时实际上你有点模拟幼虫形成形象，但又把它抽象化了。

所以，我想说的是，在你这里，身体在你的处理下，从我的解读来看，它不是一个非常具象、大家日常认为的有边界、有明确形状的，实际上它是相对发散，甚至凝聚了时间的，而不是我们现当下坐在这里的身体。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处理，也间接可能回答了身体作为技术的试验场，在你这里身体已经被重构了。

回过头来说我自己，当然我的这几个研究，从给大家展现的来说，最直白的就是关于辅助生殖技术和身体的关系。它当然很直白地好像是一个技术的试验场，但同时也是要记得这个技术的失败率非常高，它的成功一刻也离不开身体。所以说身体是技术的试验场，还是说可以反过来呢？

实际上这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因为在这里技术是在受身体检验的。当然，反过来说这也是对的。我还是想强调一下，我第一个研究也非常有意思，这里面的技术是日常生活的技术，很精妙的一个 everyday technique（日常技术）。因为从我在农村做完这个研究之后，我停止了每天洗澡，我不再每天洗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也是我对自己身体感知的一个改变。

王佑佑：我稍微回到一下郭城老师刚刚的解释，在您的设计当中，除了赖老师讲到的可能是一个抽象化身体之外，我能感觉到你是期待观众的身体在其中通过一个房间到另外一个房间，不管是光线或者看到物件的一个变化，产生不同的体验。然后想到这个身体最早的规训的来源之一，就是现代房屋的出现，一个大的空间开始进行切割，然后有厨房、有卧室、有起居室等。人们根据进入不同的空间环境当中，然后身体会自然而然发生不同反应。比如起居室用于睡觉，厨房用于做菜，这让我想到这样的关联。

接下来想问的是，继续沿着这个思路，关于刚刚讲到的技术已经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赖老师可能有一个反向思考，即关于卫生条件。我们是否存在去工具化的想象，或者因为大多数日常理解中，技术是一

种工具，我们是使用者，那技术是否有可能与人共生共存，形成我们开头所说的某种语法。

郭城：我觉得技术与人的共生共存，我想回到刚才赖老师讲的卫生这一块。我们会看到那样的厕所，以现在城市人的眼光看可能觉得不卫生。但我觉得回到共生总体的概念，人和周围环境的微生物菌群是一个整体化状态。当然，作为城市人，刚到那样的环境可能无法接受，容易生病，皮肤容易产生变化，但生活一段时间后，身体菌群和当地菌群充分交换，充分融合，形成一个新的微生态、微环境，就能达到新的平衡。这让我想起 17 年在荷兰驻留时，住在一个 squatters' community（棚户区），当时条件很艰苦，分给我一个小木屋，地上铺个毯子当褥子，盖个被子。每天早上起来门上都被蜘蛛网封住，时间一长就见怪不怪了，地上有虫子爬，我在旁边睡觉也无所谓。刚去的时候，我皮肤长了很多红点，但过了一阵慢慢就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融入的过程。回到你刚才提到的技术与身体之间的关系，如果把生物也看作一种技术，这种共生关系也是一种技术关系。其实这也是从排异到接纳到共生共荣的关系。

赖立里：在这一方面，人类学有非常经典的一本著作——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在《身体技术》一文中首次提及“身体技术”这一概念。这里讨论的身体技术，实际上是说身体一直在使用各种工具，比如扔石头。身体和技术是不可分的一部分。如果把技术这个概念拓宽，技术一直伴随着人类，实际上它（技术）未离开过此处。郭老师作品中对身体的处理非常有意思，因为它涉及底层技术与身体的概念，即身体是否有一层神圣不可侵犯的边界，技术总是外来的，因此才会有技术是否侵犯我们、我们是否要保卫自己的思考，这其中还涉及我们如何确定自己的主体性。当然，这说起来更复杂，这也是一个可能引发大家对技术不断追问的问题，即我们如何认识身体，甚至思考技术是否外在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概念。除此之外，我们为何会发问技术是否可脱离我们存在。

郭城：恰恰不能脱离。以著名电影《太空漫游 2001》开场经典镜头为例，猩猩拿起骨头作为工具，从而打败了另一波猿人，其基因得到延续，获得了水池等资源。因此，人的存在和发展与技术紧密相关。

《太空漫游 2001（1968）》电影剧照。

这还让我想起托马斯·斯韦茨（Thomas Thwaites）的“The Toaster Project”，即烤面包机项目。他想从零开始用土法制造面包机，于是去英国矿山挖云母片，收集废料电解获得铜丝，还想自己炼塑料，后来发现不可能，于是找了很多回收塑料。他用木头和凿子挖了一个模具，把熔融的塑料倒进去做成壳子，最后凑成了一个面包机似的东西，但一插电就掉闸。他用了归谬法，先假设这个东西成立，再证明其不可能，或反过来。他想证明的是，我们日常用来维持生命的物品，其实背后有很多年的技术积累。他用很戏谑的方式反向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恰恰证明了这种不可分割性。

托马斯 · 斯韦茨，《烤面包机项目》，装置，2009。图片来源于 V&A 美术馆馆藏。

王佑佑：所以，在探讨身体与技术的关系时，并非身体与技术为二，而是身体是技术现实的一部分，无论从历史还是当下来看皆是如此。

作为方法论的田野调查

王佑佑：刚刚两位老师也提到了很多，无论是你们在乡村还是墨脱田野中的穿梭，接下来我想请你们简单聊一聊“田野”。老师们对人类社会都有很细微的观察，且距离非常近，我想了解一下两位老师是如何进行观察的，你们的田野方法大概是什么样子。

赖立里：田野这个词本身就很有意思，因为人类学一直认为田野是其专有名词，但现在大家都在使用，甚至艺术家也在用。然而，确实不能将其视为人类学的专有名词。换句话来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做田野并非简单地到那里去体验当地生活就完事了。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田野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首先，

前期的准备非常重要，并非一无所知地前往，实际上这也并不可能。

在这之前，你当然需要对田野进行大量的了解，同时，又要保持一个暂时的假定状态，即要同时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因为你不可能仅凭查阅资料就了解和理解一切。这是首要前提，你必须亲自到当地去。然后，在地的日常生活一定是丰富的，远远超过你之前的任何准备。在田野时，你要尽量保持开放。

但正是因为在地的日常生活如此丰富多样，你会很容易迷失，眉毛胡子一把抓。所以，你还是要有一个大致的方向。你不可能假定自己住了一段时间就能了解这些人。我最经常跟学生说的话是，你了解你的父母吗？你要是跟他们做个访谈，你可能会发现太多太多你不了解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田野并不简单，而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既要有开放的状态，同时又要找到你的方向。这个方向正好与你全身心投入、作为研究者以及你自己背后的成长经历、历史、兴趣点有关。所以，两位人类学学者到同一个地方，完全可以写出两本不一样的东西。并不是说你只要到了同一个地方，就能把这个地方全部做全做透，这本来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后，在田野中，你要做一个真正的参与观察者。如果你没有任何之前的训练，那你确实很多事情只是流于表面。因为你自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如果你对这个地方没有太多的兴趣，只是老师指定了你要到这里来做研究，你看不到太多东西，因为你无法融入，没有兴趣。所以，你自己如何？

人与地方能产生共振、有契合点很重要。我们始终开放，若在此地无法融入、待不下去，可换个地方，不强求，需有缘分，有契合点才能待下去，产生共振，看得更深、想得更远。我博士田野考察时，常讨论日常卫生，因为我爱干净。我到村子本要做农村医疗研究，却面临日常卫生难题。如佑佑所言，还改变了我的日常卫生习惯，这很有意思。

我常举一个朋友的例子，他也做相似农村医疗研究。他是丹麦人，到中国北方农村，他感兴趣的是，为

何这家人招待自己吃简单的馒头、小米粥，客人来了却好酒好菜招待？为何对家人反而如此？最后他发现，馒头、小米粥最舒服，是家人最熨帖的食物，无需装模作样。这对他而言是很有意思的发现。基于我们两人不同背景，在同样北方农村发现了不同兴趣点，并深入探究。

王佑佑：谢谢赖老师分享，我们大概了解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想问问郭老师，您作为艺术家在墨脱待的日子，有无类似或不同体验？

郭城：我很同意赖老师说的，田野这个词这些年很流行。我上大学学设计，当时管这叫调研或基地考察，需去别人那里做用户访谈、收集数据，如观察使用习惯、日常行为，为设计前期调研指导后续设计。按赖老师刚说的人类学角度，我去墨脱那段经历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田野。我去时目的不明确，单纯体验。可能是我第一次到这种原始森林，当时冲击很大。刚下车时，我感官分辨率没达到环境精度，所有东西都是绿的、糊成一团，过了 12 天才看清植被层次。那边有拟态昆虫，如竹节虫等藏在下边，有挂着蛹、小巢穴等，慢慢眼睛才适应环境，知道看到了什么，然后区分见过和没见过的、有趣的，再向旁边科学家询问、讨论。所以要在地紧急调整感官来适应状况，才开始体验。

其实，虽然当时很多展览作品是在体验之后创作的，但在体验过程中并无这些想法。每天切身参与并做笔记，记录当日活动及有趣之事。几个月后，临近过年，因暑假已过，需出方案，在截止日期逼迫下不断回顾。当有一定时间距离再回看时，体验有所不同，能抓住当时感受最深的内容并将其创作成作品。

此前，我还有一些实地经验。比如，我曾做过一个追寻互联网关键节点物理定位的项目。首先，我获取了一些互联网关键节点的 IP 地址，通过网上的 GeoLocation 反查功能，获得了一些真实地理位置的坐标，然后前往现场。

这更像是带着目的性去的，我原本的目的是想找到运行该 IP 的机器或机房，但到了现场，就像赖老师说的，即便做了很多准备，但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因为定位的地方可能是在研究机构、政府机关、学校等场所，要么进不去，要么进去后无人带领，根本不知道目标在哪，遇到了各种困难。这种在项目中“鬼打墙”式的感觉，或者到了一个看似明确的地点却立即原地迷失，给了我很切身的感受，后来就有了那个项目。

那个项目名为“网络游者”，围绕着这些节点展开。该项目本身是在三维世界中寻找虚拟世界的边界，这本身就像是一种不可能的行为，一种妄图穿越次元壁却不可能实现的尝试。这种切身的感受引发了我后续的一些创作，包括影像装置等。

赖立里：我想补充的是，艺术家的田野经历给了我很多冲击和想法。艺术家的优势在于，他们拥有敏锐的感觉，这得益于他们的训练。就像我刚才一直在想的一本书，科学史家洛琳·达斯顿（Lorraine Daston）的《客观性》（Objectivity），里面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实际上很多判断，包括感官、感觉这些功能，也是需要训练的。它能捕捉到一些可能我们未重视、稍纵即逝的东西，比如郭老师做的风车项目，你用了生态位视角，我也去看过，当时惊叹于风力发电的规模如此巨大。但我没想到它的生态位及其深层内涵。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它也有优势，因为我看的是地表之上人类的生活，而你看到了更深层的东西。更现实地说，我接触了其他影像艺术家，同样的东西对艺术家来说能获得材料，我们人类学家似乎不太容易获得。这背后可能不仅是感觉的问题，我不知道郭老师是否如此。经费会更充足吗？艺术家的身份是否能让当地人更容易接受，更愿意交流？比如，我认识的艺术家拍摄了非常珍贵的萨满照片，对我们人类

学家来说，要调研并拍到这么珍贵的照片，不可能一个月内完成，至少要和萨满成为好朋友，做很长时间的田野工作才有可能。所以，这里面当然有经费问题，也有艺术家名头是否让你更便利地接触田野的问题。另外，我还想到王欢，他有个在圈里很知名的项目，是通过艺术创作的形式去河北做民间宗教的研究。

郭城：我觉得“艺术家”这个名字有两面性。有时以艺术之名，好像很多事情就合理了。就像赖老师说的，我们常在这个圈子里做研究的人看不见那些东西，因为艺术家经常看这些东西，所以很新鲜，有时拿来就用效果好像还可以。当我们日常在这个领域很熟悉的东西借用过后新鲜感退散，是否会产生一种疏离感？

但我觉得在某些场景下，艺术家身份也不那么好用。因为艺术家给人一种没有组织、游手好闲的印象。其实你去很多地方，比如像张伟老师，他亲自去了很多地方，包括墨脱，他自己跑去跟当地政府谈判，这些都需要有机构或学校背书才能进入一些层面的交流。那么我觉得作为艺术家，包括像您提到的策展人王欢，他可能作为一个个体，以个人魅力或优秀方式打入当地内部，一方面靠个人在某些层面的研究优势，但在一些层面，如我们此次墨脱之行去了很多地方，有些地方锁着门，无人带领或无钥匙则无法进入，即便与对方关系再熟，毕竟那是人家集团或开发建设公司的地盘，对方不会带领。

在环境保护机构的名义下，我们去进行兰花移植，这样的行为是被允许的，因此要看具体场景和具体行为，其中才可能存在一些空间。

人类学与艺术的跨学科合作

王佑佑：谢谢两位老师，两位都讲了对对方领域的一些理解和想法，那有没有可能在任何程度上达成人

类学和艺术之间的合作呢?

郭城：我觉得合作已经在发生。很多艺术家可能用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但这种方法可能不那么严谨，按学术规范来说不符合规范，不过我认为这种方法论的借用很常见。艺术其实没有什么方法论，包括我在建筑学院学设计时，老师曾说建筑也没有什么方法论，就是构筑法，其他方法论都是从其他领域借来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抛开学科建设的风格，方法论上的通用性其实会给彼此带来一些有益的成果。

赖立里：我们今天的对话也是一种合作，对吧？我也很期待，觉得人类学和艺术，或人类学跨到艺术领域，应该是很有意思的。

技术中的权力与博弈

王佑佑：我们现在可能要进入下一个话题，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我们想通过两位老师各自在研究和思考或创作方面的具体提问来探讨。首先想问问赖老师，因为在您的文章中，尤其是辅助性生殖技术部分，提到医院作为技术权威机构，会给很多女性提供各种建议和指示，但很多人等待一整天，可能只能得到两分钟左右非常快速且潦草的建议，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就医排队难现状。

同时，这些女性也有自己的主动性，会各自用不同方式获得更多的医疗建议，无论是科学上的还是民间知识上的，您在论文中提到这形成了某种实践理性，是在实践中获得的一种判断力。我们很想问，您觉得这是不是作为身体或个体在与技术权威之间达成某种协商？这种协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形成?

赖立里：我写那篇关于实践理性的文章时。当时应是对医院的权威提出了一些批评，因为文章强调两个情况相似的女性，一个面临是否移植胚胎的问题，另一个子宫内膜较薄。一位大夫建议不宜移植，另一位无任何建议，之后有大夫建议不宜先养囊，而另一位仍无建议。女性经过衡量后做出决定，但无法判

断哪个建议更好。

这种协商的一个重要之处在于技术本身并无保证，大夫也很难给出明确建议，因此决策权在于个人。大部分人依靠朋友间甚至微信群的讨论来判断，这实际上表明医疗决策并不完全依赖于医生的权威。这显示出有打开的空间，但医疗权威仍然非常重要和关键，因为大部分做辅助生殖技术的女性最终还是听从大夫的建议。毕竟，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有可靠保证的方向。大夫更多地在次要方面提供指导，如移植后的注意事项等，以尽量达成预期结果。从我的研究和启发中，我认为医生和病人都需要。

实际上，大家很尊重身体的反应，因为身体本身的状态医生也只能从外在来了解。身体是属于自己的，“我的身体我做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何更好地倾听身体的声音，关照身体，并根据身体情况勇敢地尝试，甚至违背某些建议，这也是一种协商或谈判的状态。

因此，我认为这项研究的重要贡献是让大家学会倾听自己的身体，认识身体的声音，让身体来指引自己。可以从现在开始训练，因为我在给学生上课时常说，你们年轻人很健康，容易忽视身体的存在和声音，比如熬夜、喝奶茶等，这些在流行文化中被认为只有中年人才会避免。

你们是否可以训练自己呢？当然，这背后涉及很多身体本身的问题，也与话语分不开，因此更复杂。但从技术和身体的角度，或者说从权威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权威不一定是坏事，但重要的是权威是否朝着更有利于身体的方向，其干预是否更有利于健康或更持久。

王佑佑：关于技术这个点，在郭老师您的新老作品中都能看到，您常用技术或相关工具作为创作材料和媒介，同时技术也成为某些作品中的批判对象。想问问您，如何思考其中的矛盾性或张力？

郭城：我觉得在我的作品里，技术从呈现角度看是材料和工具。但对于我绝大多数作品来说，技术本身

就是内容，是我讨论的核心。

技术、人、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就是作品讨论的内容，对我来说它们是一体的。这和我们之前谈到的技术和人的关系一样，人和技术是一体的，互相纠缠、互相影响、协同演变。在我的作品里也是，我刚才听到赖老师讲辅助生殖技术的变化，我觉得这和单纯工具化的技术最大不同在于技术在技术系统里循环，在身体上更精微的系统上应用，差异非常明显。所以像赖老师说的，为什么它只是辅助，因为身体的感觉和状态才是决定性的。

王佑佑：我记得您之前做过一些短视频相关的作品，在短视频中搜寻您想要的对象。您之前也提到民间技术的使用反映了一些未被规训的创造力。

郭城：那个作品是 2021 年或 2022 年做的装置《风的验证》。当时想讨论互联网的发展，包括现在社交媒体平台对草根人群的赋权状态。在那个项目里我回溯了，我小时候在北京生长，经历了 SARS，记得特别清楚。虽然 SARS 期间都停课，街上无人戴口罩，但需注意从新闻报道来看 SARS 的致死率远高于新冠。柴静曾采访北京地坛医院，该医院为著名传染病医院，采访时亦未戴口罩，两人交流亲切。然而，若放在当下，此情况难以想象。这反映了社交媒体变化对人行为的影响，当时电视里亦无人戴口罩，新闻亦未报道，信息单纯自上而下传导，人们便觉得无事。但在过去两年的新冠疫情中，通过短视频平台，人们看到了许多个体的真实状态及其应对环境、病毒对家人、周围环境及生活的影响。

在 Web 1.0 时代，如博客或门户网站，这样的网络流动性是无法想象的。如今，我们迎来了超交流、超在场，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视频平台看到他人。因此，这次疫情对大家的心理冲击比过去更大，因为通过短视频平台，我们看到了太多个体的真实状态，这是以前不会有的冲击。

社交媒体在诸多事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个体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布扩散信息，造成自下而上的影响。在相关作品中，也讨论了社交媒体赋予大家新的权利，自下而上地对单一口径的信息传播产生共同影响的过程。

王佑佑：在赖老师关于民间知识或技术的研究中，医药方面是否也有相关体现？

赖立里：确实有很多，比如我们的《采药去》这本书里有大量民间知识。这本书主要讲国家如何决定每个少数民族的医药发掘整理。比如民间有很多做法术、通过仪式甚至巫医来治疗的，但为了进入国家层面、写入课本，他们刻意添加了一些内容，如“蛊”字旁加“毒”。

在人类学里并没有“迷信”这个词，不能将其描述为迷信。蛊毒有具体症状及药物治疗方法，实际上有仪式，但在科学化过程中被去掉。从民间角度看，这只是为了让其被国家承认，但在实际实践中可能仍会被使用。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丰富民间知识与正统标准化、体制化知识之间的博弈一直存在。

中医有自己的历史，在民国时期，“祝由科”非常重要，负责做法术，但很快被取消，而民间仍保留。最常见的是小孩夜晚啼哭要招魂，我给学生上课时，有 12 个本科生表示小时候经历过。家里会带孩子去做这样的事，止住孩子夜夜啼哭。民间知识非常丰富。

王佑佑：就是说它确实存在，但您已经回答到它如何与正统知识协商，或者我们不能抵抗，但要进行协商。

观众问答

观众一：两位老师好，我主要想问关于技术和身体关系的问题。我想知道两位老师认为技术是否处于广义上的身体或具身经验边界之内，还是处于边界上、两者之间（in between）的状态？因为很多时候技术只是可忍受或可接受的状态，比如骨折后用拐杖行走很难受，会让身体其他部位疼痛，虽然赋予了行走能力；骨折后用的金属板在安检时会被检测出来，拆除时会留下伤疤，还需要额外愈合。人安装截肢后的假肢也可能有幻肢状态。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技术可能处于所谓的身体（body）和非身体（non body）的边界上。虽然二元划分不太好，所以我想了解一下两位老师对这个现象的看法。

赖立里：这个问题很好，因为我前面谈得也比较笼统。把技术和身体混到一起，就像你的例子，能亲身体验到金属板不是身体的一部分，最终还要拿出来，但我想针对的是现在老是把技术当成很外在的，甚至有点像敌对的态度来对待它。所以我会有这样的说法。

实际上身体本身是很开放、有边界的。比如你的经历，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因为那块金属板曾经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即便后来取走了，但在它的辅助下，你的骨骼对齐状态实际上与金属板密不可分。所以，就像你说的，它可能是在内，也可能在外，它始终是一个之间（in between）的状态，主要取决于我们讨论这个话题时的关注点。

比如我做民族医药研究时，在海南遇到一位以治骨折闻名的民间医生。有个病人被医院直接送到他那里，医院说他们的治疗没这位医生好，因为还得打石膏，不能随意移动病人。而这位医生就用几根树枝、柳条固定一下，上药后很快就好了，不用那么费劲。但也不能说用了柳条就不是外在治疗手段了。

所以，我觉得这其中的关联性是一步一步的。我突然想到昨天给朋友讲的一个例子，就是针灸。在传统

医疗实践中，针刺技术时刻都在帮助身体，它扎进身体，然后又拿出来。但我认识的这位医生对针很有讲究，他要用黄金做的金针，还是用银针或不锈钢的针，技术实际上又可以细分。所以，确实有很多层次，看你想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方面的，笼统地说，介于之间、之内、之外都可以。

郭城：我觉得技术和身体的关系，以你提到的例子来看，或许可以再拆分一下。拆分成技术环境、技术手段或技术工具。如果我们承认当下生存的环境是技术塑造的，那么环境对身体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从人的演化史上来说，200 万年前的最早一批智人，他们的头部骨骼、牙齿结构形态和现在不一样，现在的门牙比原来小，后面的磨牙也比原来小很多。这是因为我们逐渐使用了工具，使用工具可以分割食物，有火可以煮熟食物，就不用特别费力地咬生肉。这是一个长期的技术环境对身体造成的影响。

而对于第一批智人开始使用工具时，那样的技术是一个一过性的技术工具、技术手段，很难说你当下这一次使用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它必然是一个分离的感觉。但放到一个不同的时间尺度或视角之下，它其实又会对这个物种产生长期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有时在看这个问题时，如果把这两个东西混在一起，就会觉得好像又分割又怎么样。

但若分开讨论，它们并非矛盾，而是并行关系。当下使用的技术手段和技术工具，也是漫长技术环境的一部分。漫长技术环境不断塑造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王佑佑：线上观众想问郭老师，根据了解，数据中心在实践中如何看待虫或者其他故障状态，又是如何应对处理虫的？谢谢。

郭城：实际上，虫在数据中心的故障中占比较小。我看过一张图表，数据中心机器故障的最大问题是温度。首先是散热，然后是能源，再是灰尘。数据中心将虫归结到灰尘中，因为数据中心的密封性已经做

得很好，唯一可能飘进去的是昆虫尸体的碎片。因此，虫被归入灰尘这一类别。

观众二：我想问郭老师，在这次以“虫”为主题的展览中，时间这个概念是否起作用？

刚才第一位提问的观众也提到了关于身体内在或 in between 的问题。我自己观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如果进化论成立，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的免疫系统已经替我们决定了什么是应该被抵抗的。什么是应该被认为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否则它不会让我们发烧。但这么多年来，技术一直在加速改变，我们今天的讨论也涉及了这一点。技术正在加速改变自然，以及身体内与外的关系。我本来没有这个问题，但听完刚才的讨论和观众的提问后，我特别想问，时间在这个展览中起什么作用？郭老师怎么看？赖老师又怎么看？

郭城：谢谢你的提问。时间在我的展览中，包括我过往的一些作品里，也是很重要的元素。因为当我们讨论展览里的技术物或技术基建时，这些物质很多都是从地里提取的，当然金银铜铁这些元素肯定是从地质地理中开采出来的。

包括能源层面，如煤、石油等，均需经过上亿年的地质运动才得以形成。因此，我们今日看似简单的行为，如发送微信，实则涉及一系列从技术产品、技术物到技术基建背后的数据中心、基站、海底光纤，再到能源等，从地质上获取能源，构成一个庞大的体系，支持我们完成这一小小动作。例如，在《占位者》作品中，一根粗大的高压电缆上仅有两颗小针引出取电，为一个小屏幕供电。

我认为这同样道理，即巨大的积累，包括地质层面、时间层面和技术层面，供给我们生活中的小事。

赖立里：这个问题非常好，时间确实非常重要。在郭老师的作品中，这一点也很明显，尤其是他主题石

蛹的对照，岩心是上亿年的模拟材质，而上面展示了虫子的孵化过程，这是长时段与短暂生命的对比。他运用的庄子思想非常巧妙，不同生命对时间的感知不同。回到技术问题，我们也可以从长时段来看，因为我们刚才一直讨论的都是长时段下对技术的开放心态。实际上，技术一直与人类相伴，但在短时段内，如你所说，变化非常迅速。我们是否也可以再次回到长时段来思考？

在郭老师提到的千年虫两亿多年的情况下，当时间已无意义时，我们如何思考？关键在于，技术对我们而言，现在是否需要一个未来的叙事方向？这恐怕是对人类自我有点自大的想法，好像因为有了技术，我们就能预知未来，甚至认为未来很悲观。但如果你从很长的时间尺度来看，包括刚才说的地球在巨大的尺度之下，我们很多的担心可能已经失去了意义。

有很多关于意识和身体的二分法探讨，实际上都在间接思考，在技术冲击之下，我们如何应对，或者说，技术应被视为外在，还是介于我们与技术之间，我们与其关系可能还是要回到人之所以为人的层面来思考这个问题。

观众三：各位老师好。在这次讲座中，大家都提到了对技术的定义，之前郭老师也说过，之前我们使用的火、石头都可以被当作技术，那我就想到在杜海姆·彼得斯（Durham Peters）《奇云：媒介即存有》（The Marvelous Clouds : Towards a Philosophy of Elemental Media）这本书中，他也对技术定义提出了看法。他认为我们现在把新颖的东西都当作技术，而对工业革命之前的陈旧工具技术置之不理。如果从这个角度定位技术，技术一直内在于人的历史和身体之中，但在工业革命之后，这种内在性的技术可能被外化成具体的工具，比如现在非常火的人机接口、脑机接口，以及我们平时无法舍弃的手机、耳机等，衍生出很多像赛博格、设备身体这样的概念。

其实这些技术在人的身体内比重不断提高。如果这么看，人的身体从来都不是自然的部分，自然这个概念也不能从非常绝对二元对立的角度去看，因为纯自然意味着没有人介入的自然，既然没有人介入，自然就不可能出现在人的认识论当中。

所以说人和自然一直相互交融、相互变通、相互共生。在人和技术的关系里，人也不是主导技术，技术也不全是人的工具。我之前看到一个学者把技术比喻成一座连绵的山脉，人可能局部改变其地形，但不可能改变技术的整体走向，我觉得这就是技术本体论的问题，应更多从后人类的视角看待技术。把人类从中心概念中移出，把更多关注点放在技术、自然等本身的存在上。以上是我的一些想法，谢谢。

*因文字篇幅所限，完整活动视频请移步 UCCA 官网活动页面回看。

文字整理：刘嘉荟（UCCA 公共实践部实习生）、陈看（UCCA 公共实践部实习生）